

# 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 双轨路径(1978 - 2010)\*

吕 鹏 范晓光

提要: 本文试图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父辈的优势地位影响子代获得特定精英身份的程度和方式,以及这一模式是否在1978 - 1992年、1993 - 2002年、2003 - 2010年这三个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通过对201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11)资料的分析,本研究发现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对子代的精英地位获得有着显著正效应,但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仍然遵循着两条相互隔离的轨迹,只是在2003年之后体制精英的子女成为市场精英的几率比1993 - 2002年有所上升。对可能造成这种代际再生产模式的原因分析表明,虽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多元化给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开放性,但未来代际再生产的趋势很可能会强化并且由体制精英占据主导。这种代际流动的格局及趋势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自市场转型以来政治经济生态的变迁。

关键词: 地位获得 代际流动 市场精英 体制精英

## 一、引 言

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地位似乎是“互通”的。这不仅表现在代内流动上两者之间有着所谓的“旋转门”机制(Cohen, 1986),而且在代际流动上,许多批判性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精英的子女可以利用父辈的优势获得政治精英的地位,反过来,政治精英的子女也有很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Zeitlin, 1974;

---

\* 本研究为浙江青年课题“中国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16ZJQN045YB)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非常感谢Ivan Szelényi、刘欣、曹洋、吴愈晓、郑路、陈宗仕、孙砚菲、李钧鹏、王雨勤、田丰等师友在理论创见和研究设计上的指导和帮助。最后,还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中肯意见。有关文章的一切建议或疑问请联系本文的通讯作者范晓光(xgfan@zju.edu.cn)。文责自负。

Schwartz, 1987; Corcoran, 1995; Dye, 1995; Schubert et al., 2013)。这一模式能够运转的关键在于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精英的子代在竞选政治职位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来自家族以及家族编织的政治经济网络的支持;而政治精英的子女可以通过昂贵的精英教育为进入顶级公司买到“入场券”,或者他们的父母或家族本身其实就同时也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其实都是一个权力精英集团(Mills, 1956; Domhoff, 2006)、“内部圈子”(Useem, 1984)、上层阶级(Scott, 1991)的成员,是同一拨人,或者说得更文雅点,“国家贵族”(Bourdieu, 1998)。尽管上层阶级一直饱受道义上的批判,但客观上,一方面“赢者通吃”保证了上层阶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构成的“确定的精英”(established elite)相互之间的代际流动——加上来自外部多多少少的“流动性”——也给掌管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集团内部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Giddens, 1973)。

那么,在强国家的社会中,权力精英内部是否存在代际流动上的“跨界再生产效应”?也就是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代际流动上是相互排他,还是说他们其实是一类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强度。在转型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官员)基本上只能从阶级出身正确的“红苗子”里选拔(Whyte, 1975),而“旧社会”里经济精英的后代,因为“市场”已经被“消灭”了,大多数失去了成为市场经济精英的机会(Davis, 1992; Goodman, 2000)。<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红色”家庭背景的强调,有助于加强政体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那些基本定型的社会,而是市场转型社会。在强国家与市场并存的大环境下,精英的再生产模式是否会形成某种独特轨迹?中国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室”(Burawoy, 2001; Eyal et al., 2003)。我们的研究有两个关键性的目标。一是“历史的眼光”,即考察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优势地位的获得模式及其机制是否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存在差异。

<sup>①</sup> 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市场”多多少少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残喘,很少量的一些“旧商业精英”的后代因此也以“自雇者”或“地下经济”的方式从事着某种程度的市场商业活动(Osborn & Slomczynski, 1997; Szelényi, 2002)。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其子女虽然失去了对父辈财富的控制,但依然可以获得政治上的某种安排。但这种“统战”职务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政治精英,且本身也是党对其“红色资本家”背景的认可。

二是聚焦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有大量的定量研究从各个社会阶层的总体流动率上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流动的延续性(heritability)的程度(Lin & Bian, 1991; Zhou et al., 1996; 李路路, 2002; 刘欣, 2003; 余红、刘欣, 2004; 张翼, 2004; 刘精明, 2005; Wu & Treiman, 2007; 高勇, 2009; 李煜, 2009),但我们将只讨论与我们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两类阶层(国家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代际流动的机率和轨迹。

第一项目标让我们必须关注地位获得模式的时期效应。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不管是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过去曾经占主导的模式都可能发生变化(Róna-Tas, 1994; Nee & Cao, 2002; Walder, 2002; 余红、刘欣, 2004; Wu, 2006; 吴愈晓, 2010; 刘欣、李婪, 2013)。不同时期分层模式的变化,可能是同一种家庭背景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政治地位变化的表现(Zhou & Hou, 1999; Walder & Hu, 2009),也可能是占据主导的经济规则变化的反映(Szelényi et al., 1995),还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国家针对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差异(Walder et al., 2013)或人事制度变革(孙明, 2011)的反映。

第二项目标让我们可以将有关国家精英的地位获得和商业精英的地位获得这两批文献放在一起考察。自所谓“市场转型理论之争”兴起以来,这两方面的文献都曾经占据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前沿(Guthrie, 2000; Bian, 2002; 边燕杰等, 2008)。但正如有研究者(吴愈晓, 2010)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研究关心的是代内流动或职业发展(career advancement),尤其是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向市场体制下的经济精英的流动(Nee, 1989; 宋时歌, 1998; Walder, 2002; Peng, 2004; 刘欣, 2005; Wu, 2006; 刘欣、李婪, 2013);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整个转型研究的文献中都存在重代内轻代际的问题(Gerber & Hout, 2004: 682-683)。尽管如此,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些文献对于我们揭示代际流动机制的启示。

在讨论市场转型以来中国政治精英代际流动的文献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在“再生产还是循环”这个描述性的命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又回来了,而党政精英的后代在成为党政精英上比其他群体的后代优势更为明显(Zhou & Hou, 1999; Walder et al., 2000; Zhao & Zhou, 2004; Lin &

Wu, 2009; Walder & Hu, 2009; 孙明, 2011)。即使一些持部分相反意见的研究认为专业技术精英在职业发展上的开放性依然较高(张乐、张翼, 2012), 也并不否认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下一代。

相反, 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在经验层面并没有形成一个支配性的答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数据局限, 相关研究匮乏。<sup>①</sup> 但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在于, 政治精英的存在是延续的; 相反, 与其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一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是在市场转型之后重新出现的(Eyal et al., 1998)。因此, 许多研究者认为他们面对的是“第一代”私营企业主, 在代际传承上很少存在“企业家父亲再生产企业家子代”的故事。<sup>②</sup> 一些研究者于是将问题转化为讨论干部的子女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几率, 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讨论“被中断”之前的家庭背景对人们“隔代”再生产的影响。不少学者都发现了来自家庭的“隔代”影响, 就像塞勒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匈牙利农民企业家的研究里提出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那样(Szelényi, 1988)。例如, 古德曼(2014)和陈明璐(Chen, 2011)各自通过地方性个案研究发现, 私营企业主中的很多人, 祖父辈和父辈其实来自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家庭的经商传统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这个发现尚未得到统计检验。吴愈晓(2010)发现, 在中国农村, 不管是“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 他们的子女在改革后进

① 虽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代际流动都可以通过综合性调查数据进行, 但这类调查中市场经济精英的样本数一直比前两者低得多。就专门的全国性数据来说, 在企业研究方面, 许多全国性抽样调查都不包含企业主个人信息而只有公司层面的数据; 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每两年实施一次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包含企业主社会和政治信息的全国性数据, 但该调查自 2000 至 2014 年的七轮调查均只设计了代内流动而没有代际流动的题目(2002 年的调查只简单询问了亲属的文化程度)。

② 这种情况在早期的经济精英的研究中是客观存在的, 但今天所谓年轻一代企业家已经崛起。可惜的是, 迄今我们尚未发现以年轻一代的代际流动为主旨、以全国性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正如有学者(吕鹏, 2013b)指出的那样, 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其实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 还有一些则是在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之前, 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 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 属于“创业”的一代。

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这项研究实际上承认了祖父辈和父辈优势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但样本仅限于1996年之前的中国农村。亦有研究认为对第一代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优势家庭背景的影响不能被夸大,有超过一半的“富豪榜”上榜企业主来自于农民或工人家庭,还有近三成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吕鹏,2013b)。但该项研究仅限于非常有限的最富裕的群体。

同时将国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流动模式置于一个模型下考察的已发表研究并不多见。在那些数量相对有限的文献中,有两篇文献与我们的研究尤其相关。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贾瑞雪和兰小欢探讨了与本文类似的话题(Jia & Lan, 2014)。他们认为,只有在财政支出占全省GDP比重更大的省份(大政府),父辈是官员的被访者才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而在总体上“父官子商”的现象并不存在。他们的研究隐约揭示了不同的制度环境(通过“政府开销投资占GDP比例”来间接测量的政府“规模”的大小)对代际流动模式的影响,但政府规模本身虽然可能会对流动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直接的解释性机制;此外,他们也没有检验“父商子官”的假说,更没有考察不同历史时段下的不同效应。

第二篇文献是郑辉和李路路利用三个城市的抽样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严格来说,这项研究只是讨论了“体制精英”(用作者自己的术语就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代际流动,经济精英(包含国有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被作者划归到了“干部精英”当中来分析(郑辉、李路路,2009:75)。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与本文相呼应的问题:中国不同种类的精英之间到底是相互分割的,还是其实是一种人?我们非常同意他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仅仅通过考察代内流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代际流动的分析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认为,整个精英阶层——严格来说是体制精英阶层——实现了再生产,但这个再生产是通过两个机制完成的:一个就是“精英排他”,也就是精英群体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精英的子女比非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精英;二是“精英的代际转换”,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

我们在本文中的主要研究发现与上述两篇文章都有部分一致的地

方,但都有较大的发展。首先,他们都只考察了父辈的家庭背景对子代现职的影响,而我们同时考察了子代的初职部门和现职部门。初职的纳入将更有利于我们从职业流动的路径依赖的角度考察代际优势传承的程度。通过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体制精英还是市场精英,他们的后代在初职上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都比非精英家庭要高,这也与早先的一项以武汉市居民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的结论相近(余红、刘欣 2004)。其次,我们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还着重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子代现职的影响。我们将子代的现职划分为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两大类。我们将在本文的“研究设计”部分详细交代变量的操作化指标。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对前述两篇文章做了拓展,真正将国家和市场两类精英同时纳入了进来。我们先是考察了父代的职业对子代成为党政精英、技术精英和市场精英的影响,进一步考察来自父代影响的差异。此外,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都既考察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我们数据的最晚年份)的全模型,也划分出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3-2010年)来剖析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给代际流动模式可能带来的差异。

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经验发现概念化为“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我们发现,一方面,体制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市场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但另一方面,父辈是体制精英的个体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父辈是工商业者的个体也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精英之间的再生产,倒更像是沿着两条轨迹在进行,只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父亲是体制精英的子女在成为市场精英上优势下降的局部现象。也就是说,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可以对子代成为精英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总体上来说,各种类型的精英在我们所考察的代际之间并没有实现人员上的自由交换。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下的“专政对象”,但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精英一样,能够较容易地成为政治精英的一员,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或确立的上层阶级(Giddens, 1973)。<sup>①</sup>

<sup>①</sup> 我们的结论看上去与郑辉和李路路(2009)的结论矛盾,但实际上并不冲突。因为他们的文章所讨论的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只是我们所界定的“体制精英”内部的代际转化。

“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精英阶层的代际流动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洞见。但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造成这种双轨再生产路径的机制有哪些?尽管与本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那些单独或主要以国家精英或商业精英的代内和代际流动为讨论对象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意思的是,尽管政治精英的文献“再生产派”占据主导,经济精英的文献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学者们用来解释各自发现的“机制”却大体一致:政治身份和教育程度是学者们最常考虑的因素。刘欣和李婪(2013)就指出,党员身份对于在公有部门成为行政精英的重要性较以往有明显下降,而其对公有部门专业精英的效应有所上升;市场部门的管理精英地位与其市场能力密切相关。

中国政治精英地位获得模式研究的许多争论是围绕“红与专”展开的。虽然官方政策并未完全放弃对家庭背景的审核,<sup>①</sup>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党员身份和高等教育视为最为重要的中间机制。党员身份测量的是政治忠诚(红),大学文凭测量的是文化程度(专)(Li & Walder, 2001)。“红”与“专”之间的区分也成为“精英二元论”(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的出发点(Zang, 2001)。尽管各有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和时代的发展,教育程度相对于党员身份的重要性在日益提高(Tsai & Dean, 2013; Zang, 2013)。

研究市场精英的代内流动的研究也会考察政治身份对他们地位获得的影响。但与政治精英的研究不同,市场精英之前的职业经历(尤其是党政部门的职业经历)是一个比党员身份更常用的指标。一些人认为有干部经历的人会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宋时歌, 1998),另一些人则认为干部在成为乡镇企业家方面不占据优势(Nee, 1991),还有人认为干部成为企业家的机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有学者认为干部成为乡镇企业家的几率在下降(Walder, 2002; Wu, 2006),还有学者则认为政治精英在成为公司企业家方面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Róna-Tas, 1994; 陈光金, 2006)。此外,高等教育在企业家地位获得方面的重要性也会被研究者讨论(陈

<sup>①</sup> 比如,政审依然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而父辈的一些越轨行为(如腐败、“裸官”)在实践中也会成为影响干部录用和提拔的因素。

光金 2006; 吕鹏 2013) ,而另有学者认为对家庭的(重商)文化资本的继承才是理解市场经济精英再生产的关键(吴愈晓 2010)。

基于以上回溯,我们将选择党员身份、初职部门和文化程度作为解释前述代际流动的机制,来考察这两类机制的作用力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段内是否发生了变化。简言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促成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代际再生产的机制也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国有部门的初职对党政精英获得产生强化作用,但是市场部门的初职作用较弱。另一方面,变化也在出现,初职部门效应在1993年后在弱化,而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这表明决定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下面的章节里,在简要交代数据来源和资料特征之后,我们将首先交代研究的设计方案和研究方法。然后将报告模型的结果。我们的模型主要涉及到三类问题:初职部门、现职部门、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出现上述研究结果的原因,并通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来揭示自1978年以来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地位获得机制上的不同,以及各自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的变化。文章最后的总结部分将讨论本文的发现对我们理解中国当前及未来代际流动的启示,以及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资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1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11)资料。该数据库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调查数据之一。经过数据筛选和清理,我们得到有效样本量为4125。表1为描述统计。

### (二) 变量及操作化

#### 1. 自变量

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我们主要通过父亲在调查时点的职业地位来测量。对于调查时点已退休者,将其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视为职业地位;对少量过世者,我们用其妻子的职业地位来替换。在数

表 1 描述统计 (%)

变量	类别	职业地位			
		党政精英	技术精英	市场精英	其他从业者
家庭背景	党政干部	18.47	17.67	8.32	5.75
	专业技术人员	9.27	14.32	5.55	3.37
	工商业者	0.59	4.38	8.17	2.50
	非精英	71.67	63.63	77.96	88.38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67	7.15	55.5	73.54
	高中	19.36	18.33	27.04	17.83
	大专及以上学历	68.97	74.52	17.46	8.63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58.74	23.55	8.36	5.89
	非党员	41.26	76.45	91.64	94.11
地区	沿海	47.37	39.98	36.07	28.14
	其它	52.63	60.02	63.93	71.86
初职时期	1978 - 1992 年	54.50	31.4	39.90	52.51
	1993 - 2002 年	27.74	28.17	37.18	24.51
	2003 - 2010 年	17.76	40.43	22.92	22.98
现职时期	1978 - 1992 年	26.72	18.93	9.07	34.12
	1993 - 2002 年	29.15	21.96	27.80	18.96
	2003 - 2011 年	44.14	59.11	63.13	46.92
性别	男	24.03	51.91	50.33	47.99
	女	75.97	48.09	49.67	52.01
初职部门	国有	81.79	70.66	21.65	20.42
	市场	10.62	20.46	56.03	27.02
	其他	7.59	8.88	22.32	52.57
现职部门	国有	92.22	70.13	2.08	15.82
	市场	—	20.76	96.62	34.75
	其他	7.78	9.12	1.30	49.42
户籍	非农	88.79	82.50	43.91	29.12
	农业	11.21	17.50	56.09	70.88
年龄		41.25 (12.03)	35.62 (11.29)	36.00 (9.00)	38.08 (11.06)
年龄平方/100		18.45 (10.02)	13.96 (9.07)	13.77 (6.83)	15.72 (8.71)
N		131	384	367	3243

注: (1) 年龄和年龄平方报告的是均值, 括号中为标准差。(2) 所有变量都已经过加权处理。

据处理上,本研究首先将“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职业编码转换为ISCO88,而后利用EGP(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框架(Erikson & Goldthorpe, 1992)将其分为11大阶层,最后再根据单位性质和职业大类区分出三大类:体制精英、市场工商业者和普通从业者。具体而言:(1)体制精英包含了党政干部(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sup>①</sup>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者)。这些人大体上也是我们平时所称的“国家干部”的范畴。<sup>②</sup>(2)市场部门的工商业者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组成。<sup>③</sup>(3)其他从业者家庭背景。包括了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群体,这里面既有体制内的普通从业者(如国有企业的工人等),也有广义上的市场部门的其他从业者,如外资私营企业的工人,还有不便归类的自由职业者等。

除了家庭背景,入职时期也是我们揭示精英地位获得的关键自变量。本研究试图考察1978-2010年中国城乡的精英地位获得过程是否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存在差异。综合考虑到政治格局代际更替和市场化进展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划分出1978-199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0年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尽管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农村的

- 
- ① 我们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划为党政干部的范畴,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首先,尽管一直在改革,但国有企业经理人在人事制度上的管理方式仍然大体上与党政官员一样(Shambaugh, 2008),真正的去行政化的改革并未落实(Chan, 2004),他们并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的“企业家”(Brødsgaard, 2012);其次,国企领导不仅与同级的政府官员享有同样或接近的政治待遇,而且拥有类似的晋升空间,最近几年国企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频繁。因此,他们至少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官员”(杨瑞龙等, 2013)。
- ② 从制度上说,我国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群的范围比这个还要广泛(余洋, 2010),但很少有人实际上再将“干部身份”等同于“干部”(Chan, 2004),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生活中可能也很少会将自己视为“干部”。为了避免纷扰,我们因此将他们统称为体制精英。
- ③ 区分出有产者(proprietor)和管理者是经典EGP框架的做法,尽管现实生活中在“管理革命”之后许多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其实也是企业的大股东,这类“大股东”往往很少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仅仅是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在EGP框架内都属于有产者,许多国内外的研究也统称他们为“企业家”(entrepreneurs)——这在英文的语境里并无不妥(Szelényi, 1988)。在中文语境中,许多人依然认为企业家和个体户之间的区别是规模上的;事实上,一直到2011年11月1日之前,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雇佣人数在8人以下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8人以上则登记为各类企业。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很多个体工商户经过发展壮大,雇佣人数早已超过这一限制。2011年之后的《个体工商户条例》对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的人数不再进行限制。我们采用了“市场部门的工商业者”这一相对中性的概念。

合作社蔓延到了城市的工厂,但占据国民经济支配地位的国营企业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第二个阶段始于1992年,到2002年止。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开启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造既给干部和新生代企业家创造了无数的机会,也受到来自利益受损者的批判(Zhao & Zhang, 1999; Huang, 2008; Lin, 2008)。第三个阶段理论上应该从2003到2012年,但实际上分析截至2010年,也就是我们数据截止的最后一年。这一时期虽然私营经济在总量上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大型国有企业的崛起也带来了关于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争议,且社会上对于干部子弟经商谋利、贫富分化等现象的批评也更加尖锐(Lin, 2008; Lu, 2012; Walder et al., 2013)。

此外,党员身份和文化程度<sup>①</sup>是我们分析精英地位获得形成机制的核心自变量。前者分为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两类,后者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

## 2. 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被访者的现职、第一份工作和目前(或最后)工作的单位类型。我们将子代职业地位分为党政精英、技术精英、市场精英和非精英等四大类。与父代一样,党政精英与技术精英属于体制精英,但我们对党政精英的界定更为严格,仅指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副科级以上管理者;同时,为了较好地将对对象聚焦于更小的群体——位居社会分层结构最上层的社会成员——我们将子代是个体工商户的归入“非精英”类。<sup>②</sup>因为如无意外,绝大多数人的初职都是从基层做起,无法像现职一样区分出精英与非精英。

单位类型分为国有部门、市场部门和其他。国有部门包括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市场部门包括外资、港澳台和私营企业。

##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和(调查时被

---

① 我们知晓将党员身份视为“政治忠诚”(红)的指标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例如臧小伟即认为党员资历是一个更好的指标(Zang, 2001)。我们亦知晓党员和企业家的文化程度可能是在职教育而不是全日制教育的结果(Tsai & Dean, 2013; 吕鹏, 2013)。遗憾的是,由于CSS2011调查没能收集被访者党员身份和文化程度获得的具体时点信息,故我们无法在本研究中对它们做时变变量处理。

② 即EGP中的IVa和IVb。这里的筛选标准要比家庭背景中的“市场部门的工商业者”更为苛刻。

访者所处的)地域。其中,户籍是影响地位获得的重要外生变量;考虑到东南沿海和直辖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我们将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作为一类,称为“沿海发达地区”,用虚拟变量来测量。<sup>①</sup>

### (三) 统计模型

为检验1978-2010年中国精英职业获得的不同模式,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囿于CSS 2011没有测量个体职业流动历程,在分析不同市场化时期精英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分样本采取相似的回归分析。<sup>②</sup>

## 三、经验发现

### (一) 初职的进入:体制的区隔

表2为进入初职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2-1、2-2和2-3还增加了文化程度、户籍和入职时期变量。总体而言,相比于非精英家庭来说,不管是体制精英家庭,还是市场精英家庭,他们的后代在进入体制内部门和市场部门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优势。具体而言,来自体制精英家庭的个体更可能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包括国有、私营和外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相比于市场部门,党政干部后代进入国有部门的几率要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后代(见模型2-1),即体制精英后代的部门进入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于市场精英的后代,他们虽然在进入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上比非精英后代都具有优势(系数分别为2.04和1.947),不过在两个部门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 )。此外,从历史时段比较来看,不论进入国有部门还是市场部门,随着市

① 目前经济学界有不少用以测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指数,其中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应用最广泛。但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该指数的一些指标存在偏差。采用指数来区分各个省份市场化程度并不是本研究的理论关切点,因此只采用了定类的方式。在绝大多数现存的市场化指数中,本研究所归纳的几个省份基本上都被认定为市场化程度较高。

② 笔者曾试图使用事件史分析(EHA)。该模型能够有效地应对时变变量(time-varying covariates)和数据model截删(censored cases)问题。但是,个体现职的获得时点和精英地位获得时点并不完全一致,在缺乏完整职业流动经历测量的情况,EHA的统计结果存在明显偏差。在此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中肯建议!

场化的推进 精英后代的几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与 2003 - 2011 年逐渐趋同 不过市场部门的进入优势要高于国有部门。

表 2 初职部门类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 2 - 1	模型 2 - 2	模型 2 - 3
	国有 vs. 市场	国有 vs. 其他	市场 vs. 其他
家庭背景 <sup>a</sup>			
党政干部	. 417* (. 175)	1. 122*** (. 215)	. 704** (. 233)
专业技术人员	-. 234 (. 203)	. 307 (. 246)	. 541 + (. 282)
工商业者	. 092 (. 254)	2. 040*** (. 478)	1. 947*** (. 427)
男性	. 392*** (. 105)	. 296** (. 103)	-. 096 (. 103)
年龄	-. 067 (. 048)	. 078 + (. 046)	. 145** (. 048)
年龄平方/100	. 177** (. 060)	-. 086 + (. 050)	-. 263*** (. 061)
东部沿海	-. 528*** (. 112)	. 767*** (. 115)	1. 296*** (. 116)
文化程度 <sup>b</sup>			
高中	1. 151*** (. 136)	1. 733*** (. 130)	. 581*** (. 143)
大专以上	2. 172*** (. 163)	2. 179*** (. 197)	. 007 (. 212)
非农户口	1. 183*** (. 129)	2. 681*** (. 117)	1. 498*** (. 134)
入职时期 <sup>c</sup>			
1993 - 2002 年	-1. 186*** (. 179)	. 587*** (. 175)	1. 773*** (. 162)
2003 - 2011 年	-1. 735*** (. 249)	. 942** (. 287)	2. 677*** (. 245)
常数项	-. 715 (. 994)	-4. 797*** (1. 057)	-4. 082*** (. 973)
观测值	4125	4125	4125

注: (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 <sup>abc</sup> 的参照组分别为其他从业者、初中及以下和 1978 - 1992。(3) + 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表3是进入现职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设定与表2中完全一致。从结果上看,家庭背景对现职部门的影响效应与初职部门略有不同,体制精英家庭后代进入市场部门没有比非精英后代更具优势(见模型3-3),这恰恰反映出体制精英进入国有部门的优势依然稳定。

表3 现职部门类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国有 vs. 市场	国有 vs. 其他	市场 vs. 其他
家庭背景 <sup>a</sup>			
党政干部	.392* (.157)	.464* (.218)	.072 (.227)
专业技术人员	-.099 (.183)	-.069 (0.271)	0.0297 (.279)
工商业者	-.400 (.253)	1.618** (.564)	2.018*** (.528)
男性	.215* (.097)	.150 (.106)	-.065 (.093)
年龄	-.154*** (.034)	-.147*** (.036)	.006 (.030)
年龄平方/100	.235*** (.042)	.196*** (.041)	-.039 (.037)
东部沿海	-.607*** (.104)	.411*** (.121)	1.018*** (.107)
文化程度 <sup>b</sup>			
高中	.722*** (.127)	1.501*** (.141)	.779*** (.131)
大专以上	2.064*** (.145)	2.263*** (.201)	.199 (.199)
非农户口	1.438*** (.135)	3.084*** (.134)	1.646*** (.134)
入职时期 <sup>c</sup>			
1993-2002年	-1.668*** (.163)	.235 (.160)	1.903*** (.152)
2003-2011年	-2.174*** (.168)	.467** (.181)	2.641*** (.147)
常数项	1.695* (.688)	-.578 (.790)	-2.274*** (.618)
观测值	4125	4125	4125

注:(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abc的参照组分别为其他从业者、初中及以下和1978-1992年。(3)\*p<0.1,\*\*p<0.05,\*\*\*p<0.01,\*\*\*\*p<0.001。

(二) 精英地位获得: 家庭背景的影响

图1 报告了1978 - 2010 年间子代精英的流入率( inflow ratio) 。党政干部家庭后代成为党政精英的比率从1978 - 1992 年间的12. 89% 上升至2003 - 2010 年的21. 69% ,而成为市场精英的比率要低得多, 1978 - 1992 年为5. 07% ,最高的1993 - 2002 年也仅为11. 99% 。在党政精英中, 来自工商业者家庭的占比在1993 - 2002 年为2. 03% ,1978 - 1992 年和2003 - 2010 年为零; 与之存在明显反差的是, 他们成为市场精英的比例从3. 48% 增至9. 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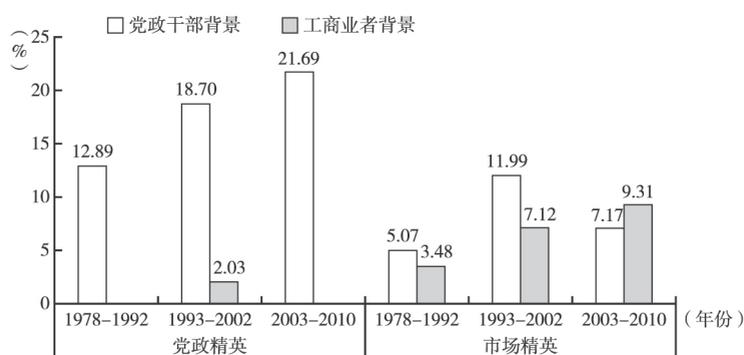


图1 党政精英和市场精英的流入率比较

以上发现来自流动表分析, 没能控制其他的相关变量, 为此我们引入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对家庭背景效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表4 中, 模型4 - 1 和模型4 - 2 都以技术精英为参照组, 比较党政精英和市场精英获得的几率。模型4 - 3 则以市场精英为参照, 直接考察党政精英获得几率。

表4 精英地位获得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4 - 1	模型4 - 2	模型4 - 3
	党政精英 vs. 技术精英	市场精英 vs. 技术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家庭背景 <sup>a</sup>			
党政干部	1. 197 ( 1. 109)	- . 746 + ( . 433)	1. 943 + ( 1. 116)
专业技术人员	1. 031 ( 1. 126)	- 1. 065 + ( . 453)	2. 096 + ( 1. 137)

续表 4

	模型 4-1	模型 4-2	模型 4-3
	党政精英 vs. 技术精英	市场精英 vs. 技术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非精英	1.402 (1.087)	-.989* (.386)	2.391* (1.083)
男性	.767*** (.216)	.348* (.165)	.418+ (.227)
年龄	.126 (.077)	.506*** (.061)	-.380*** (.088)
年龄平方/100	-.107 (.086)	-.595*** (.075)	.488*** (.101)
东部沿海	.160 (.207)	.282 (.172)	-.123 (.226)
文化程度 <sup>b</sup>			
高中	-.499 (.413)	-1.236*** (.279)	.736* (.370)
大专及以上	-.640 (.422)	-3.096*** (.309)	2.456*** (.413)
中共党员	1.326*** (.229)	-.007 (.249)	1.333*** (.281)
初职部门 <sup>c</sup>			
市场	-.338 (.399)	1.878*** (.233)	-2.216*** (.406)
其他	-.422 (.400)	.866** (.301)	-1.289** (.395)
户口	.301 (.423)	-.530* (.250)	.831* (.413)
入职时期 <sup>d</sup>			
1993-2002 年	.246 (.278)	1.399*** (.277)	-1.153*** (.333)
2003-2010 年	.227 (.283)	1.628*** (.281)	-1.401*** (.326)
常数项	-6.428** (2.010)	-9.376*** (1.247)	2.948 (2.146)
观测值	4125	4125	4125

注: (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 <sup>abcd</sup>的参照组分别为工商业者、初中及以下、国有部门和 1978-1992 年。(3)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具体而言,模型 4-1 表明,相比于工商业者背景,不论是党政干部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体制精英家庭背景对子代获得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地位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体制精英家庭对子代获得市场精英地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党政干部后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几率是工商业者后代的 47.43% [ $\exp(-.746)$ ],专业技术人员后代的几率为 34.47% [ $\exp(-1.065)$ ]。在入职时期方面,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市场精英获得的几率存在明显时期差异,2003-2010 年最高。

在模型 4-3 中,我们发现党政精英背景对子代获得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的地位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分别为 1.943 和 2.096),而且非精英后代成为党政精英的几率也与参照组存在统计差异( $p < 0.05$ )。由此,我们认为,体制精英和工商业者的后代在精英地位获得上具有优势,但是他们的“跨界效应”却并不明显,即体制精英后代成为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可能性更大,而工商业者后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更大(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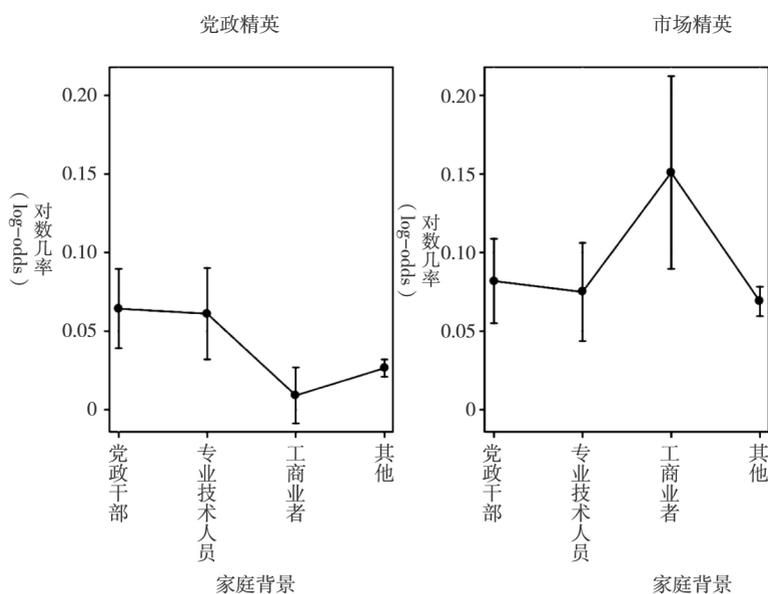


图 2 家庭背景对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

(三) 精英地位获得: 家庭背景效应的时期差异

家庭背景对精英地位获得是否存在时期效应? 其中的机制是否呈现新的趋势?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 我们对子样本做了多元回归分析, 重点考察体制精英和工商业者家庭背景的影响效应。我们在模型 5-1、5-2、6-1、6-2、7-1、7-2 中都纳入了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和初职部门变量, 其中模型 5、模型 6 和模型 7 分别基于对 1978-1992 年、1993-2002 年和 2003-2011 年子样本的分析。在文化程度上, 其效应在三个时期都表现出稳定的正向作用, 不过 2003 年后略有下降; 在党员身份上, 它对党政精英的影响在 1992-2002 年间不显著, 在前后的两个时期不仅显著, 而且 2003 年后效应呈现增强趋势; 在初职部门上, 国有部门经历对其成为党政精英或技术精英有正效应, 市场部门经历对人们成为技术精英却存有负效应。概言之, 统计结果传递出以下两方面特征: 国有部门的初职对党政精英获得产生强化作用, 但是市场部门的初职作用较弱。另一方面, 变化也在出现, 初职部门效应在 1993 年后在弱化, 而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日益增强, 这表明决定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最后, 我们要花适当笔墨回应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即母亲是否会带来叠加效应? 虽然不少类似的研究只考虑父母一方的职业, 但我们一开始仍然试图在模型设定上增加母亲的职业。但数据中母亲职业缺失量较大, 最终带来有效样本量大量遗失, 导致统计偏差。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中国的婚姻匹配以“男高女低”和“男女相当”为主导(李煜, 2011; 齐亚强、牛建林, 2012), 那么, 相比于用父亲职业地位来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 用父母职业地位之和作为家庭背景代理变量, 其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很可能会更大。因此, 不论叠加效应存在与否(父母的独立效应理论上是一致的), 都不影响我们去实现研究的目标。

表 5 精英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分时期比较

	模型 5-1	模型 5-2	模型 6-1	模型 6-2	模型 7-1	模型 7-2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家庭背景 <sup>a</sup>						
党政干部	12.55*** (1.726)	-.281 (2.069)	.202 (1.408)	.355 (.886)	15.52*** (.507)	1.256* (.530)

续表 5

	模型 5-1	模型 5-2	模型 6-1	模型 6-2	模型 7-1	模型 7-2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党政精英 vs. 市场精英	技术精英 vs. 市场精英
专业技术人员	12.44 *** (1.647)	-.148 (2.008)	.522 (1.383)	.394 (.876)	15.03 *** (.722)	1.487* (.598)
非精英	12.51 *** (1.446)	-.518 (1.867)	1.216 (1.315)	.989 (.830)	15.52 *** (.379)	1.175 ** (.447)
文化程度 <sup>b</sup>						
高中	1.875 ** (.705)	2.329 *** (.659)	1.179 (.825)	2.443 ** (.763)	.345 (.728)	.727 + (.375)
大专及以上	3.295 ** (1.072)	4.127 *** (1.005)	3.394 *** (.839)	4.500 *** (.823)	1.994 ** (.767)	2.477 *** (.390)
中共党员	.227 (.851)	-.828 (.824)	.964* (.488)	-.199 (.488)	2.147 *** (.426)	.389 (.343)
初职部门 <sup>c</sup>						
国有	3.005 *** (.889)	2.539 ** (.878)	.752 (.749)	.614 (.679)	1.089 + (.611)	.620 (.389)
市场	-1.147 (1.009)	-2.241 + (1.154)	-1.915 (1.313)	-1.891* (.779)	-.671 (.743)	-.703 + (.3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7.354 (9.231)	12.91 + (7.650)	2.473 (5.698)	11.43 ** (3.939)	-14.52 *** (2.779)	5.473 *** (1.585)
观测值	1514	1514	845	845	1766	1766

注：(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 <sup>abc</sup>的参照组分别为工商业者、初中及以下和其他部门。(3) 模型同时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100、地域。(4)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四、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试图通过“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这一表述来概括本文的主要经验发现。这个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精英地位的再生产。不管是体制精英还是市场精英，都更有可能将他们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子代。二是虽然无论个案研究还是新闻报道都显示“一家两制”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性抽样数据表明，从整体上来说，这两种职业地位延续

的壁垒依然存在,子代对父代优势地位的继承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跨界效应”。

也许有学者会认为,这种格局只是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暂时性现象,随着更多代人的成长,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之间的相互代际流动最终会成为精英阶层再生产的主导模式。我们并不掌握第三代家庭成员的职业流动数据,因此暂时无法对更长期的趋势做出预判。但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两个原因都来自本文的经验发现。一方面,市场精英和体制精英在吸纳模式上的多元化趋势正是精英地位流动依然维持一定程度开放性的动力。我们以上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分析表明,对精英们而言,初职部门的重要性在1993年之后都较之前有了明显下降,而党员身份对获得体制精英的作用不断强化,同时文化程度的影响保持稳定。这种多元化如果能够长期化,就会对整个阶层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发现,在2003年之后,父亲是体制精英的子女在成为市场精英上出现了局部优势。这种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程度可能被低估。正如一份晚近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父母中至少一方是党政干部的子代在金融业和党政军群机关、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任职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子女(李宏彬等,2012)。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即便是投身商界,相比于自己开办实业做企业主这种“风险”较高的行业,一些官员的子女更加偏好去诸如金融、房地产、能源这样的收入丰厚的境内外企业担任经理人,或者扮演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介和服务角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常规手段进行的社会调查对这部分群体的覆盖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完全没有暗示这样的行为即涉嫌寻租。事实上,子代从事商业活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些研究指出体制束缚自由、晋升渠道较窄等,反而可能推动子女走上体制外的发展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让这些活动严格按照法律和党章进行。

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管理者的子女“从政”被低估的可能性则要小很多。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们通过调研获取的一些个案来看,近年来这一现象在一些地方似乎有所增多;但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常常会被“低调处理”不同,这基本上是一件不用刻意去隐瞒、甚至很多时候值得去“夸耀”的家族成就。当然,企业家的子女从政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的动力总体上可能并不大。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市场精英

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甚至党代会在内的渠道实现个人或家族的政治地位(Tsai, 2007; Dickson, 2008; 吕鹏, 2013), 在一些基层, 甚至有直接让民营企业主担任地方党政机关副职以资鼓励的做法(张厚义, 2007; 张厚义、吕鹏, 2012)。

因此, 如果未来精英之间代际流动的跨界开始加速, 那么在既有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家子女从政这条轨迹的可能性不会显著增加。这一判断背后反映的是, 套用布迪厄的术语, 市场精英仍然是“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级”(Bourdieu, 1998)。这也是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得出的对中国当前政商关系格局及未来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 精英研究的意义, 不只是为了解他们掌握资源的多寡和渠道, 更要去分析他们掌握的资源转化成其他形式资源的方式。因此, 正如有学者已敏锐地指明, 对精英的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 或者说, 从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权力与不平等(Khan, 2012)。本文指出, 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再生产, 基本上是在两条轨道上进行的; 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再生产基本上混合在一条轨道上进行的格局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 本文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中国研究”, 而是给理解中国的代际流动的机制提供了国际和历史比较的视野。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 这一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精英循环或精英再生产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从何而来的新场景。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说, 在经过几代人之后, 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究竟是从同一群人中产生, 还是完全隔绝的两种人, 抑或相互渗透但一方主导, 仍然取决于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博弈。博弈的方式和结果, 也将对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或分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 2008,《导言: 评述与展望》,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光金, 2003,《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社会参与分析》, 陈光金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No. 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5,《1992—2004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一个新社会阶层的成长》, 陈光金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No. 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6,《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学习与探索》第1期。

- 高勇 2009,《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古德曼 2014,《新经济精英:地方权力的社会基础》,《中国研究》第1期。
- 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 2012,《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经济学(季刊)》第4期。
- 李路路 2002,《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煜 2009,《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第6期。
- ,2011,《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精明 2005,《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欣 200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2005,《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刘欣、李楚 2013,《中国转型期城市精英的地位获得:所有制部门有差异吗?》,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工作论文。
- 吕鹏 2013a,《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13b,《新古典社会学中的“阿尔吉之谜”: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学海》第3期。
- 宋时歌 1998,《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齐亚强、牛建林 201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孙明 2011,《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社会》第5期。
- 吴愈晓 2010,《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杨瑞龙、王元、聂辉华 2013,《“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1期。
- 余红、刘欣 2004,《单位与代际地位流动:单位制在衰落吗》,《社会学研究》第6期。
- 余洋 2010,《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社会》第6期。
- 张厚义 2007,《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成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厚义、吕鹏 2012,《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分化与政治面貌变化》,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主编《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乐、张翼 2012,《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青年研究》第1期。
- 张翼 2004,《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郑辉、李路路 2009,《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第6期。
- Bian, Y.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 Bourdieu, P. 1998,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ødsgaard , K. E. 2012,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The Party in Control?"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 Burawoy , M. 2001, "Neoclassical Sociology: From the End of Communism to the End of Cla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 .
- Chan , S. 2004, "Research Report: Cadre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 1990 – 1998." *The China Quarterly* 179.
- Chen , M. 2011 , *Tiger Girls: Women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Cohen , E. 1986, "The Dynamics of the 'Revolving Door' on the FCC."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4) .
- Corcoran , M. 1995, "Rags to Rags: Pover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 .
- Davis , D. 1992, " 'Skidding' : Downward Mobility among Children of the Maoist Middle Class." *Modern China* 18( 4) .
- Dickson , B. 2003 ,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 Private Entrepreneurs ,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mhoff , W. 2006 , *Who Rules America?: Power , Politics ,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McGraw-Hill.
- Dye , T. 1995 ,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Clinton Years*. NJ: Pearson.
- Erikson , R. & J. Goldthorpe 1992 ,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yal , G. , I. Szelényi & E. Townsley 1998 ,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 2003,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class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73( 1) .
- Gerber , T. & M. Hout 2004, "Tightening Up: Declining Class Mobility during Russia's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5) .
- Giddens , A. 1973 ,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arper & Row.
- Goodman , D. S. 2000, "The Localism of Local Leadership Cadres in Reform Shanx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24) .
- Guthrie , D. 2000, "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Victor Nee and Andrew Walder." *Sociological Forum* 15( 4) .
- Huang , Y. 2008 ,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 , R. & X. Lan 2014, "Capitalism for the Children: Entrepreneurs with Cadre Parents under Big Government." Working paper of Fudan University.
- Khan , S. R. 2012, "The Sociology of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 Li , B. & A.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 - 19961.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5) .
- Lin , C. 2008, "Against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Argument. "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 1) .
- Lin , N. & Y.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3) .
- Lin , T. & X. Wu 2009,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 Structure , 1978 - 2005. "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5.
- Lu , P. 2012,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Supercommunism? China's New Perspective. "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79( 3) .
- Mills , C. W. 1956 ,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e ,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 .
- Nee , V. & Y. Cao 2002,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 2) .
- Osborn , E. & K. Slomczynski 1997, "Becoming an Entrepreneur in Poland , 1949 - 1993: Recruitment Patterns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es. "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19.
- Peng , Y.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5) .
- Róna-Tas ,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 .
- Schubert , L. , T. Dye & H. Zeigler 2013 , *The Irony of Democracy: 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Cengage Learning.
- Schwartz , M. 1987 ,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 The Corporate Elite as a Ruling Clas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cation.
- Scott , J. 1991 , *Who Rules Britain?* London: Polity Press.
- Shambaugh , D. L. 2008 ,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zelényi , I. 1988 ,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2002,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Socialism or an Auto-critique of an Auto-critique. "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 2) .
- Szelényi , S. , I. Szelényi & I. Kovách 1995, "The Making of the Hungarian Postcommunist Elite. "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
- Tsai , K. 2007 ,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sai , W. & N. Dean 2013,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 *The China Journal* 69( 1) .
- Useem , M. 1984 ,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 the US and 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 2002,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 - 199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 .
- Walder, A. , B. Li & D.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 1949 to 1996.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2) .
- Walder, A. & S. Hu 2009, "Revolution , Reform , and Status Inheritance: Urban China , 1949 - 1996.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5) .
- Walder, A. T. Luo & D. Wang 2013,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s. " *Theory and Society* 42( 6) .
- Whyte, M. 1975,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 *The China Quarterly* 64.
- Wu, X. 2006, "Communist Cadre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 1978 - 1996. " *Social Forces* 85( 1) .
- Wu, X. & D. Treiman 2007,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 2) .
- Zang, X. 2001, "University Education , Party Seniority ,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0( 1) .
- 2013 ,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Zeitlin, M.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5) .
- Zhao, W. & X. Zhou 2004,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Reform Era. "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2) .
- Zhao, X. B. & L. Zhang 1999,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and Regionalism in China: A Review. "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2( 3) .
- Zhou, X. & L.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 .
- Zhou, X. , N. Tuma & P. Moen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 1949 - 1993. " *Social Forces* 74( 3)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吕鹏)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范晓光)  
责任编辑: 闻 翔

The Social Context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e enterprise in northern China ..... *Xu Zongyang* 63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labor emigration , the aging rural population , and the “hollowing-out” of villages ,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practically necessary. On the one hand ,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growing rapidly. On the other hand , the urban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agriculture are encounter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 and finds out that the managerial problems of these corporations “from outside” can be partially solved by mobilizing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rural society. However , the “unsolvable” problem i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these corporations , who are considered outsiders. This dilemma will likely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 during which the capital “from outside” and the rural society will continue to interact with and shape each other.

Policy Attributes and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  
..... *Zhu Yapeng & Ding Shujuan* 88

**Abstract:** Literature on polic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largel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policy diffus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actual attributes of the policy being diffused and how the policy evolves after its adoption and during diffusion. Drawing on the case of “Shantytown Upgrading” policy in China ,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olicy attributes affect policy adoption and diffusion. It finds out that decision-makers considered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the policy when they made decision to adopt “Shantytown Upgrading” and the specific policy attributes affected the speed and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diffusion. The scope , range and nature of the policy were also transformed and redefined during the policy diffus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By highlighting how policy attributes affect policy adoption and diffusion , and what happens at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in the political ,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transitional China , this paper contributes both to the diffusion studies and China studies.

The Dual-Track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Elites in China: 1978 – 2010 ..... *Lv Peng & Fan Xiaoguang* 114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during 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how parents' advantaged occupations have been influencing the hazard rate of their children's status attainment in certain elite positions, and whether these patterns show varieties during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1978 – 1992, 1993 – 2002, and 2003 – 2010. Based on merged data from CSS2011, by using event history analysis, we find that although parent's advantaged position has a persistent effect on children's status attainment, its function in general does not break the "dual trajectory reproduction model", which means that state elite and market elite tend to reproduce itself without revolving access. It is only after 2003 individuals whose parents are state elite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market elites. We try to explain these findings, and reveal that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this ongoing structural reproduc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specially for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market elites. These changing mechanisms reflect the macro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Migrating Together or Staying Behi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usehold Arrangement during Rural-urban Migration .....  
 ..... *Li Dai & Zhang Chunni* 139

**Abstract:** It is an emerging trend for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 that rural laborers migrate with their spouse and children rather than migrating alone. Due to the lack of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amples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previous studies fail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arrangements during migration.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by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family migration, including the husband migrating alone, the wife migrating alone, the couple migrating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nd the couple migrating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how different decisions on migration made between the coupl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so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in the rural area under three hypothesized decision-making scenarios.

Research on the Earning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Self-Selecti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nclave Participation ..... *Wei Wanqing* 164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2010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